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 从传统到现代

——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

米列娜 编

伍晓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Edited by Milena Dolezelová Velingerová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本书根据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

书 名：从传统到现代

——19 至 20 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

著作责任者：米列娜

责任编辑：张文定

标准书号：ISBN 7-301-01620-4/I·0260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166 千字

1991 年 10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

定 价：8.00 元

# 目 录

序.....	乐黛云 ( 1 )
中译本自序.....	米列娜 ( 3 )
导言.....	米列娜 ( 1 )
“新小说”的兴起 .....	曹淑英 (16)
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研究.....	米列娜 (35)
晚清小说的叙事模式.....	米列娜 (56)
环境小说:《官场现形记》 .....	唐纳德·霍洛克 (76)
《九命奇冤》中的时间: 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 .....	吉尔伯特 (120)
《老残游记》: 讽喻叙事 .....	特兰德·赫利奇 (134)
《孽海花》的戏剧结构.....	彼得·李 (157)
《恨海》的人物塑造.....	迈克尔·艾格 (172)
《九尾龟》: 色情小说还是谴责小说? .....	吉恩·杜瓦尔 (185)
译后记.....	(198)

# 序

我和米列娜其实是同学，我们都曾先后师事中国当代著名的戏曲小说研究专家吴晓铃教授。只是我几经坎坷，往往不得不放弃学业，而米列娜却始终如一，锲而不舍。70年代末，她关于《浮生六记》和鲁迅作品的研究深深地吸引了我。她所采用的方法、选取的角度，以及她正在开辟的一些新的研究层面都激发了我的很大兴趣。1980年我翻译了她的新作《论鲁迅的“药”》。这篇文章是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鲁迅小说的一个很好范例，在《国外鲁迅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发表后，引起了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而我对当代西方文学分析方法的兴趣也就一发而不可收。

1981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米列娜热心邀请我暑假去参加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符号学研究班。这个研究班建立于1973年，每年一次，每次4-6星期。许多著名学者如艾柯（Umberto Eco），格雷玛斯（A.J. Greimas）等都参加过研究班的讨论。在那次研究班上，米列娜用符号学分析了中国电影《闪闪的红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决心从事“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研究，回想起来最早就是受到米列娜的启发。

《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一书虽不是米列娜的专著，但处处闪烁着她的智慧，体现着她的多层面的分析方法。米列娜编写这本书的用意，如她自己所说，是在“寻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根”，“以便五四运动不被人误解为一个与中国的过去断然分隔的文学事件”。我想她的书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

的。目前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日渐多起来，而米列娜不能不说是最早的路先锋之一。在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世纪转折”之时来读米列娜关于上一个“世纪转折”时期的小说研究，确实别有一番滋味。我很高兴由于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是张文定同志的帮助，这本书终于能在这“世纪转折”之时和广大中国读者见面。

米列娜属于那种永不满足现状，不断开拓进取的学者。正当她的第一本中文译本即将出版之际，她的另一部与前一部全然不同的新作又寄到了北京。这就是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诗学——东方与西方》。这部书第一部分是关于印度、中国、日本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理论探讨；第二部分讨论东方和西方诗学创造与感知的模式；第三部分研究中国叙述学源流；第四部分谈“交叉的符码”。其中第三部分是米列娜近年来率领她的学生共同完成的科学成果。特别是米列娜自己写的“十七世纪的中国叙述学理论：系统和概念的重构”一章更是她本人近年来深入研究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的叙述理论的结晶。

希望米列娜的第二本新作也能很快与中国读者见面，更希望这本书和前一本书一样幸运，能有像伍晓明同志那样高明的译手。

乐黛云

于北大中关园

1991年6月10日

## 中译本自序

欣闻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发行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一书，无限的感慨与温馨的回忆涌上心头。回忆将我带回到 1958- 1959 年。那时我第一次踏上华夏大地，来到北京的文学研究所学习，我的导师是郑振铎先生和吴晓铃先生。那一年于我的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正是在那一年，我开始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这一理解不仅源自书本知识，还来自我对中国人的生活的感同身受，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人和西方人治学之道与生活方式的不同之处。

或许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差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北京的求学生活结束二十余年以后，我蓦地领悟到，中国文学可以用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来研究，亦可以用当代西方的学术手段来探索。晚清小说作为这样的研究课题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在七十年代，西方很少有人问津晚清小说；加之，我深信寻求中国现代文学之根，意义深远。五四新文化运动常常被人误解为一个与中国的过去断然分隔的文学事件，因而成为一个困扰人的文学难题。此外，晚清又是中西接触交往中的关键的历史时期，虽然它又是一个痛苦的时期，我感到从一个异于中国人的，新的角度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晚清小说是一个适宜的题目。

至于我成功还是失败了，现在是中国读者做出判断的时候了。我深知，有些读者会和我的见解相左，书中亦不免有欠缺和谬误；但是，学术领域的进步源于我们前辈的积极的贡献，同样也受益于他们失误的前车之鉴，那么，不论这部晚清小说的研究专著得

到当代中国读者的首肯还是受到他们的批评，两种反应于我都是重要的。难道拨动今日中国读者的心弦，引起他们思索，不正是对当年在中国求学时给予我广博知识的师友的更好的回报吗?!

米列娜

1991年4月

# 导 言

米列娜

1897年至1910年间的中国晚清小说，传统上称为“谴责小说”。这个专称是鲁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赋予这一时期小说的。鲁迅认为，谴责小说是一批性质极其相似的文学作品，其共同的倾向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鲁迅的权威及其著作的开创性——第一部中国小说史——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对于晚清小说特点的描述成为流行看法；尽管已有许多学术著作极大地丰富了鲁迅简略的、并非总是准确的观察。然而，只有以对这个时期作品的详尽考查为基础，采用各种新方法进行研究，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晚清小说。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对于晚清小说更为广阔的理解。它的结论指出：晚清小说可以被视为五四时代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因为晚清小说展现的各种性质，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才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

如果将晚清小说视为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阶段，那么，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由1919年五四运动引起的剧变而造成的学术观点，就令人怀疑了。在我们的研究之前，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人们意识到了晚清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将其作为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372页。

过渡现象加以研究的必要性。这使我们受到启发和鼓舞。我们在此特别感谢捷克的亚洲文学研究专家们，他们在1965到1970年之间撰写的三卷著作概述了产生亚洲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V.L.Semanov）也把晚清小说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前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发展的框架。他概述了晚清小说与以前的中国文学的联系与中断之处，并且论证了晚清小说对于鲁迅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之发展的重要性。然而，上述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一般文学和比较文学方面，这就使它们无法充分详细地描述晚清小说，谢曼诺夫论述了当时两位杰出作家李宝嘉与吴沃尧，捷克学者的贡献则限于系统阐述一般趋势，却未分析具体的晚清小说。

在这个参考框架中，晚清小说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全亚洲发生的普遍演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演化过程是一个关键性的文化变革过程。我们的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只有对晚清小说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揭示出它对于这一过程的贡献。然而，由于晚清小说数量巨大，难以穷尽，我们的分析只能基于有限的一些作品。

由于我们既要注意作家的文学才华，也要注意某些特定作品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因而所选作品中有一些是公认的杰作，

---

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中国小说的变化与连续性》，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编《“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麻省，坎布里奇，1977），第385-404页；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1929）；陈炳：《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三版（上海，1931）；亨利·冯·博文（Henri van Boven）：《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1946）；复旦大学《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北京，1960）；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vosiav Prusek）：《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中叙事者之作用的变化》；霍尔慕特·马丁（Helmut Mavtin）：《1897-1917年中国文学的一个过渡概念：梁启超论诗歌改革、历史剧和政治小说》。

奥德里奇·卡拉尔（Oldrich Kral）等：《亚洲现代文学兴起与发展研究论文集》第三卷（布拉格，1965-1970）。

瓦尔迪米尔·I. 谢曼诺夫《中国小说的演进》（莫斯科，1970）及《鲁迅和他的前驱》（莫斯科，1967）。

它们包括李宝嘉（1867- 1906）的《官场现形记》，刘鹗（1857- 1909）的《老残游记》，吴沃尧（1866- 1910）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曾朴（1872- 1935）的《孽海花》；另一些是不太著名的作品，如李宝嘉的《文明小史》，吴沃尧的《恨海》和《九命奇冤》；还有几乎完全湮没的作品，如张春帆（卒于 1935 年）的《九尾龟》。

既然这些供分析之用的小说选自经过仔细考查的大量作品之中，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小说中可以发现的特征，虽然并非详尽无遗，但已能够代表整个时期。

人们常常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解释为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激烈而短暂的过程，五四运动明显的反偶像崇拜的性质，则似乎是这种解释的主要理由之一。然而，这种解释未免有些简单化，因为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学中那些虽然不太明显，但却非常重要的演化过程。这些过程在达到极盛时期之前很早就已开始，到现代则变得十分显著。在这些过程中，高级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和相互影响是为中国文学史赋予新生命的张力，但是这种相互影响还没有被作为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因素而加以充分认识。

然而，忽视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之间的相互介入和相互影响，就可能造成像正统的儒家美学所倡导的那种对待中国文学的非历史的态度。许多世纪以来，这种严格的规范美学固执地坚持着两种相互排斥的中国文学观念。一方面，存在着一些文学作品，它们符合这种美学的标准理想并受限于双重功能：传播儒家圣贤的伦理原则与经世济民，这是姚鼐在十八世纪总结出来的；另一方面，存在着以文言或方言写作的小说和戏剧，它们被认为没有任何教化价值的纯粹消遣，因而受到儒家文学观念的排斥。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中间，姚鼐（1731- 1815）、曾国藩（1811 - 1872）和林纾（1852- 1924）等著名桐城派代表人物再次强调了这一儒家正统观念。但是，他们的理论显然与发展中的文学情

况相矛盾，因为这一理论没有考虑白话小说、戏剧和文言小说中发生的实际变化。从十七世纪起，白话小说和戏剧就融合了以前仅仅存在于文言诗歌与散文中的许多方面的东西，感情关系、社会批判、爱国热情以及表达作者政治立场和个人经验这样一些主题都被白话文学吸收了。白话发展成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媒介，它在许多方面被文言所丰富。而且，小说与戏剧作家本身就是文人，正如他们的读者和观众也是文人一样。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文言中篇小说从民间传说中汲取主题，并且也像小说和戏剧那样，表达作家个人对社会事件的反应。这样，文言与白话小说的发展就显示出某些共同的趋势。如果我们要区分实际文学情况与中国存在两种截然分开的文学这一儒家神话，我们就必须详细研究这些趋势。

晚清时期，儒家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中的新趋势的对立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目睹国家悲惨景况并且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和现代西方国家启发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业已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新时期需要创造一种标准的文学语言，一种既能用于写作又能用于口头交际的语言，需要创造面向整个民族而不是少数优秀分子的文学。这批知识分子开始创造并系统阐述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即中国民族文学的观念。

中国民族语言的形成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是两个平行发展的过程，两者均始于晚清。在这种历史背景中，高级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便获得了全新的性质，它不再限于两种并存的文学形式的相互影响。相反，白话文学却成为一种民族文学，获得了新的地位和尊重。因此，晚清理论家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和戏剧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些文学类型展示的特性与白话文学观念最为接近，但是它们受到儒家文学观念的排斥。

主要是刘师培和章炳麟，积极寻求小说与民族文学遗产的结合。刘师培在 1905 年写的《论文杂记》中论证说，古代学者提出的文学观念并不适用于现代，值得认真注意的不仅是以文言创作

的文学，而且也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戏剧，与儒家学者不同，当他说“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的时候，他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仅看到变化，也看到了进步。虽然没有直说，但章炳麟也破例地将小说包括在中国文学的框架之内。在1906年的《文学论略》中，他试图将中国文学的各种形式系统分类，而且十分有趣的是，他把小说与历史和官方文献置于同等的地位。

章炳麟和刘师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们建议采用民族文学的概念，从而在理论上打破儒家在“高级”与“低级”文学之间划分的界线。在一个不同的层次上，著名儒家文学家王国维（1877- 1927）也打破了禁止接触白话文学的障碍。他在1904年写了杰出的《红楼梦评论》，后来又撰写了论宋元戏剧的开创性著作。然而，上述学者的兴趣主要仍在过去的小说上面。

系统阐述小说使命的工作当时落到其他晚清小说理论家身上，他们之中著名者有严复（1853- 1921）、夏曾佑（1865- 1924）和梁启超（1873- 1929）。在这些理论家们的著作中，小说不仅作为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被接受，而且还被提高为民族文学的核心和最重要的文学类型。小说获得这样的地位是因为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启蒙力量，因而也是实际上促成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最重要力量。晚清理论家不无天真地得出结论，认为小说在诸如英、美和日本等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过决定性作用。他们坚信小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也会起同样作用。

初看起来，在改良主义者倡导的小说教育作用与儒家将文学作为实用主义的和意识形态的工具的作法之间，似乎没有明显区别。梁启超在1902年系统阐述小说的社会作用时，甚至使用了人们熟知的说法：“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改良主义者确实与儒家共同分享了功利主义

---

章炳麟：《文学论略》，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1937）第731- 741页。

的文学观念。然而，在有关文学的功利作用的问题上，改良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根据他们的政治立场——保守或激进——他们关于文学的功利作用的理论与对于传统小说的评价或与儒家一致（如梁启超），或截然不同（像夏曾佑）。

我认为，梁启超对小说理论的富有想象力的和高度创造性的丰富，主要是由于他把来自完全不同的传统——与白话小说相联系的传统——的观念吸收进小说理论。夏志清最近评论说，在明代的许多白话短篇小说的序言中，我们发现对于小说的感情力量的强调。《古今小说》的序言强调作者有能力讲述“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的故事，光绪（1875- 1908）年间的《今古奇观》序文说，书中所收皆属“可悲可喜可歌可愕”的故事。这样的说法一方面强调小说的感情力量，同时又总是使它从属于小说的教化作用。这也许来自被通俗化和简单化了的佛教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将认识过程设想成为在很大程度上有感觉和知觉参加的一系列自觉的经验阶段。实际上，这种认识观念后来成为一部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的主题。然而在《红楼梦》中，感情是以原先难以想象的力量爆发出来的。

晚清时期常州词派中最富有想象力、最有创新精神的成员之一、著名词学家况周颐（1859- 1926），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认为审美对象的创造和理解与感情的“沉着”是一致的。戈丽吉娜（K.T.Golygina）推测，况周颐的“沉着”理论来自佛教的认识论。她还指出，许多晚清的小说理论家注意到，小说能够创造一个特殊的精神世界（境界），即读者的感情入迷（emotional, fascination）；我也倾向于将晚清小说理论家对于这类问题的注意与佛教传统联系起来。众所周知，佛教传统根本关注的东西不是形

---

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见《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念》，Adele, Rickett 编，普林斯顿 1978 年，第 226 页。

该理论的详细讨论见戈丽吉娜的《理论》，第 158- 169 页。

同上书，第 213 页。

而上学的或神学的，而是心理学的。

试图系统解释小说的感情力量的梁启超明确指出，他的许多思想观念都源于佛教禅宗。梁启超为小说的四种力量下了定义，这些力量把读者从对于小说的朦胧不定的理解逐渐导向要摹仿文学作品主人公的强烈愿望。他把小说的最大力量“提”视为佛教中一切自化其身之法的最上乘。这恰好符合通过小说对读者进行启蒙的思想，该种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

晚清小说理论中，既有儒家和佛教的文学美学传统的结合，又有来自十九世纪末日本大政时期的综合性质。现在，与高级文学相连的和与白话文学相连的两种不同的中国文学传统的诸要素被结合起来，并且与外国的相调和。这种综合的小说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晚清小说本身的性质。

晚清小说理论曾经极力主张将小说作为民族文学的基本类型来接受。在中国的批评史上，这样的主张第一次得到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系统发展和接受。晚清理论对小说创作实践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由于消除了有关小说的陈腐偏见，并赋予小说崭新的社会和美学地位，这种理论为小说创作的空前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就有几百部新的小说问世，还有更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进来。

应该注意到，一些创作小说和大多数优秀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的。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趋势是用方言，特别是用吴语方言创作小说。然而，完全以方言进行小说创作的试验很快就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而且，由于采用白话——未来的民族语言——创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文言小说的复兴也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正是白

---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马立安·高利克（Matian Galik）曾指出梁启超理论中外国和佛教的影响，具体讨论见她的《论外国思想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1898- 1904）》，《亚洲与非洲研究》，2（布拉迪斯拉发，1966），第38- 48页。又见戈丽吉娜《理论》，第210- 216页。夏志清在《严复与梁启超》一文中提及，梁启超曾采用专门的佛教名词。

话小说赢得了晚清小说的主导地位。

因此，我们所做的假定，即晚清小说表现出许多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性质，基本上是以我们对白话小说艺术特点的分析为基础的。这种分析是本书最为关心的。现在，我想概述一下这些成果。

从小说主题上来说，所有这此小说描写的都是 1880 年至 1910 年的中国。其中绝大部分小说直接涉及这段时期内发生的事件，例如 1898 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外敌入侵和中央集权的衰落等。这些危机使中国知识分子强烈意识到传统中国的衰落、与西方痛苦的接触和现代化的必要性；正是因为小说抓住了这种气氛。才使读者如痴如狂。而且，没有任何一位前代小说家像晚清小说家那样力求忠实地描写他们自己的时代。中国现代小说一反传统小说的习惯，不再假说事件发生于过去或发生于非特定的时间，而是直言不讳地宣称：读者所读的就是作家观察到的现实。

晚清小说的地点背景极其多变，反映出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它的流动性正在日益增长。我们查看过的小说中只有一部（即《老残游记》的地点背景固定在山东一省。在这一点上，它袭用了传统小说情节通常固定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特定地区的模式。在其它小说中，人物自由往来于各省，观察或参与关系到整个中国的事件。情节现在经常发生在东部沿海大城市，特别是上海，而不是内地省城。如果我们抛开《西游记》和《镜花缘》中的神游不论，那么小说中的场面现在第一次越出了国界。例如，李宝嘉的《文明小史》描写了首批中国海外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与活动；他的《官场现形记》中有几个情节片断发生在英国；曾朴的《孽海花》的主人公，有名的学者兼出洋公使，曾远涉重洋，出使德俄两国。

晚清小说所描绘的各种社会背景也十分广阔。大小官吏及其妻妾、军人、商贾买办、失业的知识分子、学生、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娼妓、仆役、乞丐，还有高高在上的洋人，这些人在

情节发展中都具有或多或少的重要作用。与传统小说不同，处在下层社会的人物在小说中并非仅起陪衬作用，他们的社会情况也得到详细描写。（例如，《九尾龟》就详细描写了妓女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些社会阶层的描写注重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常常与传统的儒家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作者常将官场生活与娼妓和窃贼的下层生活联系起来并加以对比（《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尾龟》），从而暗示读者，在敲诈勒索、行贿受贿和尔虞我诈的基础上存在的这些社会阶层具有基本的相似之处。

最后有必要强调，社会事件并非晚清小说所专注的唯一主题，因为爱情与感情主题的重要意义也日益增长。这两类主题经常交织在一起（《孽海花》、《恨海》和《九尾龟》），表现出敏感的个人的命运与无情的社会压迫力量之间的冲突。

我们可以说，晚清小说抓住了正在形成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这种主题变化范围使人想到欧洲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它表明，晚清小说有作为民族文学的能力。

晚清小说的叙事形式、手段和风格的惊人的多样性配合了其主题与背景的广阔性。晚清小说是一个巨大的坩锅，传统叙事手段和试验性的革新手段在此熔为一体。

这种情况反映在“小说”一词的广阔外延上。以前小说只包括轶事、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晚清理论文章中所使用的“小说”一词则进而包括文言的古代传说、弹词、杂剧和传奇，甚至包括西方小说。

传统标准与审美原则的松动是乐于接受外国小说，甚至想要在中国小说创作中采用外国小说创作技法的原因。在本书《九命奇冤 中的时间：西方影响与本国传统》一文中，讨论了为什么只有某些外国小说创作技法能被成功地采用，而其他技法则未

被采用、甚或未加考虑的原因。然而，被试验的创作技法并非仅仅因为它们来自外国而遭到拒绝。有些小说，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或陈天华的《狮子吼》（1905）在艺术上被证明是失败的，因为它们的作者未能克服政论文与小说之间的根本艺术差别，虽然两位都是杰出的雄辩的论文作家。他们使叙述带上过多的政治议论，而几乎没有注意如何将这些议论与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他试验则大大地激发了新的小说创作方法的产生，从而表明，现在是各个作家，而不是传统规则，控制并决定着最终的叙事形式。例如：我们能够在情节的结构原则方面观察到明显的变化。《孽海花的戏剧结构》一文指出，《孽海花》的情节仍然是按照传统小说那种典型的宇宙轮回说和佛教的报应说构思的。然而《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一文表明，这种传统的情节结构方式正在被各种情节结构模式所取代。这些情节结构模式将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赋予形形色色的素材。

唐纳德·霍洛克在对《官场现形记》的详细讨论中，证明了该书的情节是依照小说中所描写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系统来安排的。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小说《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尾龟》的主人公通过从一个社会集团进入另一个社会集团而逐渐发现这些关系。一般说来，与儒家伦理和传统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情节的悲剧性结尾。主人公与强大的社会力量进行的斗争是不成功的，他们非败即亡。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九尾龟》的主人公，他虽未功成名就，却在幸福的爱情中得到了安慰。《九尾龟》这部小说的双重结尾及其强烈的感伤主义标志着注重政治的晚清小说的衰退，预示着本世纪最初十年感伤与色情小说的流行。

爱情与感伤的主题也有助于另一个重要改变，这一改变预示着后来的现代短篇小说的面貌。本书迈克尔·艾格在分析《恨海》和吴沃尧有计划的“写情小说”时，论证过这些主题如何使